

宫廷与江南：清代苏州玄妙观及城东社会的崛起

朱春阳

（苏州博物馆）。

清代道教逐步衰弱，然而苏州玄妙观却迎来了发展的关键期，在观舍规模、社会地位等方面都有了质的提升。此种变化固然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，然而朝廷的推动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。以苏州玄妙观为中心江南社会的崛起，向来受到学者的高度关注，研究成果十分丰富。相比之下对于玄妙观本身研究稍显不足，实际上唐宋以来苏州玄妙观一直在吴地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本文以此为切人，剖析清代朝廷与地方社会内在的互动机制，探究玄妙观城市中心形成的内在衍变。

一、“权力彰显”：宫廷与江南关系的历史渊源

宋代以来，苏州玄妙观一直与宫廷有着重要的历史渊源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。

（一）“君权神授”：宋代以来君权思想在玄妙观的渗透

“万寿庆典”，是“习仪祝厘”，的重要形式之一。所谓“习仪”即演习礼仪，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。如《左传·昭公五年》记载：“为国君，难将及身，不恤其所，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，而屑屑焉习仪以亟。言善于礼，不亦远乎？”“祝厘”即祈求福佑，如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记载：“今吾闻祠官祝厘，皆归福联躬，不为百姓，联甚愧之。”由“习仪祝厘”衍变而来的清代“万寿庆典”在玄妙观等寺观开展有着历史的渊源，至少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王权的宗教色彩。祖先崇拜是道教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，古代社会统治者专门建有祭祀祖先的庙宇，规定一整套严格的祭祀制度。这样做的目的，是为了宣扬统治者的尊贵，“因为推本朔源，他们的祖先都是远古时代的显赫帝王，以此来证明天命之所归和现阶级统治的合法性。”（周振鹤. 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[M]. 上海：复旦大学出版社，1997，第二册：429.）唐朝李氏皇室为抬高社会地位标榜其为老子后裔，故而尊称老子为“太上玄元皇帝”。据乾隆二十一年刻《长洲县志》记载，唐开元二年（716），“帝感祖锡瑞之，更名为开元宫，赐内帑重修”。“开元宫”即玄妙观的前身，帝王“祖先崇拜”思想的凝聚推动玄妙观不断发展。正如《元妙观志》序言所称：“唐有天下自以为李氏精苗，遂尊老子为元元皇帝，若礼经所谓所自出之祖，由是宫观遍天下。”（顾沉. 元妙观志[M]. 清道光十二年弥罗宝阁刻本.）古代社会祖先崇拜意在证明王权的合法性，“统治权力只有具有了社会的‘合法性’，即这种统治权力符合社会中大多数人关于公正、公平和道德的观念，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认可”。（李路路. 再生产与统治-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[J]. 社会学研究，2006<2>。）对于道观而言，一旦有了“权力”作为依附，便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。据《元妙观志》记载：“追宋真宗托天书之瑞，特建玉清、昭应宫，以崇奉香火，而其教益大行。”正因为王权与神权有机融合，玄妙观地位迅速提升。以圣祖殿修建为例：

闰十月己巳，上“圣祖”尊号曰“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”，“圣母”懿号曰“元天大圣后”，遂加太庙六室尊号。群臣上帝尊号曰“崇文广武感天尊道应真佑德上圣钦明仁孝皇帝”。戊寅，建景灵宫太极观于寿丘，以奉圣祖、圣母，且诏天下天庆观并增建圣祖殿。

（陈邦瞻. 宋史纪事本末<卷 22>天书封祀. 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:171.）

又以玄妙观通神庵为例，该庵曾为何蓑衣真人所居，“淳熙三年左街道篆李若济奉命建，亦御书其额，有高、孝二庙间安书

及金字牙牌”。（《元妙观志》）朝廷利用祖先崇拜神化王权在《元妙观志》白玉蟾《诏建三清殿记》中同样清晰可见：

君人者欲表仪天下，所以示国家尊祖之意，凡今诸郡之天庆观，所以祠圣祖也。人本乎祖，矧我国家，仙源衍庆，圣系流禧，使不尊崇上灵之祀，其何以炳圣祖在天之灵也。孝宗皇帝有旨，平江府天庆观建三清殿，殿成，亲洒宸翰“金阙寥阳宝殿”六大字，扁之殿眉，示吾尊祖也。

王权思想在玄妙观占据重要地位，支配着人的思想意识形态，受此影响祖先祭祀活动在玄妙观的开展有着重要意义。缘于人们认知水平有限，当时神灵信仰弥漫整个社会。

随着科举事业的兴盛，王权彰显的宗教神秘性日益淡化，祈祝仪式逐渐与儒学活动相融合，加速传统礼制的构建。明洪武年间，朝廷于玄妙观设立地方宗教管理机构即道纪司，并将三清大殿确立为“习仪祝厘之所”。殿前列有“钟鼓楼”，吴地举子定期习仪于此，如《坚瓢集》曾载明代“吾郡蒋熹，年十一为府学生，遇圣节赴玄妙观习仪”。玄妙观亦是地方官员习仪的场所，如《元妙观志》记载：“崇祯十五年七月四日夜，烈风大作，雷震三清殿，龙驭灾，旧设龙驭于殿中，府县官每遇长至元旦万寿千秋节，先一日习仪于此，是日行礼，忽雷霆击碎石柱，龙驭遂毁。”祀典功能还在修观过程中有所体现，《重修东岳行宫记一首》即说该殿“冶钟一悬，为晨旦祝厘之节”。然而，明代万寿祈祝活动多为官方主持，社会参与程度偏低。该时期，地方家族以城西较为密集。入清后，随着家族的迁徙此种局面逐步发生改变。

（二）“衣被天下”：明中叶以来江南织造与玄妙观关系的构建

明洪武元年即 1368 年，在玄妙观附近建立苏州织造局，由地方官督管。根据孙佩《苏州织造局志》记载，永乐以后该局由皇帝亲派内官、内使、太监直接接管，以满足朝廷消费的需求。这些太监便住在玄妙观附近，“太监弄”也因此而得名。织造局之所以设立于此概与此处民间织造兴盛有关。元成宗元贞元年在玄妙观内建立吴郡机业公所。明英宗正统年间（1435-1449 年）拆玄妙观内三茅殿基，建机房殿，主祀轩辕黄帝神像。为苏州丝织机业的正式行会组织，机匠向机户揽织，后发展至乡匠揽机织造，概向机房殿书立承揽，交户收执。并征收织机月捐，名曰：“机捐”。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带来新的雇佣关系集中反映在玄妙观织造行业。实际上，几乎与明中期间门地区商业繁华的同时，城东亦因织造业兴起而获得了发展，据明蒋以化《西台漫记》载：

每晨起，小户百数十人傲傲相聚玄庙口（即玄妙观一引者）听大户呼织，日取分金为饔飧计。

与手工业发展同步，明中期城东游观就已初步兴起。隆庆《长洲县志》记载，相对于城西“靓妆炫服，堕马、盘鸦，操筹倚市，葑、菱、齐盖罕矣。惟以织造为业者，俗曰机房妇女，好为艳妆，虽褻欠雅矣”。社会发展推动下，玄妙观的重要性愈加突显，这也成为清代新生大家族迁徙的重要背景。

二 “权力攀附”：家族迁徙的社会现象分析

（一）入清后，以玄妙观为中心吴地大族出现了大规模迁徙至苏州城东地区

仅根据同治《苏州府志》的统计，迁玄妙观所在的长洲县就有石氏、沈氏（3 家）、李氏、杨氏、陶氏、陈氏（2 家）、周氏、蒋氏、汪氏等 12 个家族。如石温玉为代表的石氏家族即是众多迁徙城东家族中的一支，其先曾祖君甫公于顺治二年迁于吴门，系迁苏之始祖，迁人地即为紧邻玄妙观的凤凰街，后亦成为吴地望族，并与彭、潘等家族建立世交。

事实上，许多家族迁徙并非被地方志书记载：此外，我们对吴地族谱、家族文书整理后可进一步窥视当时的盛况

第一，彭氏世族：明初彭氏家族由江西迁人阊门，在其壮大过程中迁徙现象随之出现。彭绍升在《彭氏家传》记载明末清初之际该家族“或居盘门，或居葑门，或居城中草桥张家巷沿仓巷，或居薪门外郭巷，或居车坊”。引文中的“草桥”位于玄妙观附近，其他地点亦多处于玄妙观所在城东地区。家族迁徙后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，从康熙至光绪两百多年间，苏州彭氏世族收到了朝廷御赐的制词 116 道。此外还有匾额、横幅共 27 块 / 幅、上谕 2 道、祭文碑文各一。朝廷会如此高密度地向一个地方世族颁发诏书的总数之多，显然令人咋舌。彭氏世族的发展只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，以文立家成为众多地方世族持家的理念。

第二，潘氏家族。潘氏家族与彭氏有着大致相同的发展轨迹。康熙初年，潘景文（1639-1706）自苏州南壕迁徙至玄妙观附近的黄鹄坊桥巷。顾颉刚曾在《苏州史志笔记》中说：“苏州人家由徽州迁来的甚多，其初率以经商，后乃渐以科第称巨族，如潘介泉家，吴湖帆家，汪仲周家。及吾嗣祖母张家是也。”顾颉刚本人及他列举的家族以玄妙观较为集中。与彭氏家族一样，潘氏家族迁徙城东后迅速成为吴地望族，发展势头甚至超过彭氏家族。

第三，其他家族。清代，家族迁徙的情况不胜枚举，如蒋氏家族，陆元城在《蒋生春生传》中说：“其曾祖怀堂公，居邓巷，读书，补元邑博士弟子员。既迁郡城临顿里萧家巷，世敦诗书，逮春生，志益笃，昼夜寒暑，不辍文章诗赋，问业于余。”引文中的“临顿里”，位于玄妙观东侧。丁氏家族亦迁徙至“临顿里”，据其族谱载：“丁氏先籍济阳世居双凤里，业耕读，自始祖赠训导克逊公讳谦迁苏郡之临顿里，隶长洲县。”曾受康熙、乾隆御笔赐额的吴氏世族据其族谱“启明，徙居苏州玄妙观前。”又如乾隆年间徐堂在《吴郡徐氏宗谱》中说：“盛朝初年，微远公始迁吴，居于城之祥符古里。迄今百有余载，子姓繁衍，科名儒业。”“祥符古里”即位于玄妙观。

（二）以玄妙观为中心城乡范围内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家族流动

玄妙观地处长洲县，与吴县毗邻。清代，除了部分家族直接迁徙至长洲县外，其他家族在迁徙过程中与玄妙观地理空间接近的趋势较为明显，不少以吴县为家族迁人地。随着空间距离与玄妙观的接近，家族由商人儒且迅速崛起的特征较为明显。如贝寿同其祖于明朝中叶由浙江金华兰溪县贝兰堂，始迁居苏州间门外南濠街经营草药生意，同时兼做中医，由于诚信经营、乐善好施，生意日渐兴盛，至乾隆间贝慕庭已成吴中巨富，并与“戈、毛、毕”，三家共被称为苏州“四富”。乾隆末年，贝家已从间门外迁居城内靠近玄妙观的桃花坞，并由商贾世家逐渐变为书香门第，此后文人辈出。又以费氏家族为例，“丁卯廷琛生。己巳廷璜生，壬申廷瑚生。府君见诸子均长大，为之色喜。一日语先姚曰安处节俭宜乡居，延师课读宜城居”，（费廷深·费氏先德录[M]。民国十一年铅印本：8.）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移居苏城。通过分析，不难看出清代迁徙的家族大多以文传家。且在迁徙后发展更为飞快，并与朝廷构建了紧密的联系。诸多家族的迁徙折射出玄妙观在吴地社会的影响。该处向来故族较多，新兴家族的迁人使得这里家族聚集现象更加显著。

三、“权力效应”：家族在玄妙观相关活动的开展

随着家族空间布局的变化，清代，玄妙观所在的城东地区成为朝廷与家族互动的重要场所，尤以康熙、乾隆两帝南巡时的万寿庆典最具典型，并拉开了家族在城东地区活动的序幕。

第一，彭氏家族与“万寿庆典”活动的开展。彭启丰在《重修元妙观碑》说：“乾隆十六年圣驾南巡，在籍诸臣于观中设经坛祝慈宁万寿，驾亲临视。越六年再建万福经坛，恩赉蒂金三百……越五年，又南巡，越三年，又南巡，礼亦如之。”“万寿庆典”对于家族的意义非同一般，甚至光绪年间彭氏后人彭慰高在《元妙观重修寿星殿记》继续提及：

乾隆四十九年岁次甲辰，高宗纯皇帝六举南巡，维时先高祖以尚书致仕家居，谋于同郡诸耆绅，在元妙观三清殿之西偏建殿三楹，供奉南极，以祝圣寿。

修观一定程度上是家族对王权的进一步彰显，与“万寿庆典”，形成呼应。家族之所以热衷于庆典及修观活动的开展，实

际有着自身利益的驱使。从对彭氏家族频繁受到的赐封看，庆典活动有利于构建家族与朝廷的联系第二，潘氏家族与“庆典活动”的开展。乾隆中期以后潘氏家族参与程度日渐提高，“封官加爵”是其热衷于庆典活动的又一动机。据《大阜潘氏支谱附编》记载，乾隆三十六年适逢皇太后八旬万寿，潘奕隽因“覃恩加一级。五十三年恭遇覃恩加一级，京察一等加一级。嘉庆元年恭遇覃恩以子世璜官封翰林院编修”。随着社会地位的上升，潘氏家族在玄妙观开始活跃。道光十五年(1835)皇太后六旬万万寿，潘曾彦与郡绅士共设经坛于元妙观，“是岁叔祖由体仁阁大学士改充东阁”。可以看出，潘氏家族较多强调“万寿庆典”的参与对于家族命运转折的重要性。

第三，范氏家族与庆典活动的开展。家族参与背景下庆典活动不断走强，缘于义田义庄为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来源。位于玄妙观附近的范氏义庄兴建于宋代，为范仲淹后人所建。嘉庆十四年皇上五旬万寿，庆典活动由范氏义庄出资，家族势力介入使得庆典活动盛况空前。

顺治三年苏州织造局迁徙至蔚门，这里亦成为彭启丰、石锡玉等大家族聚集之地。原织造局改建为织染局，俗称“北局”。人清后，织造局新址成为康、乾两帝南巡的行宫，更是地方家族送往迎来之地，这些活动的开展与玄妙观庆典活动形成空间的呼应。在民间万寿庆典热情高涨的背景下，乾隆末年在玄妙观南修建万寿宫殿，这些都使得城东地区的重要性愈加突显。当然，这只是清代玄妙观变化的一个缩影，社会慈善等诸多家族活动广泛开展，由此拉近了宫廷与江南的关系。在国家与家族共同作用下，玄妙观所在的城东地区逐渐迎来了空前的繁荣。